

# 长安北魏佛教造像分期研究

## ——以纪年造像为中心

于春

**内容提要** 长安北魏纪年造像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为5世纪后半叶至太和二十三年(499),造像样式与同时期的云冈造像大致相同,出现地方特色。中期为景明至孝昌年间(500—527),像体较清瘦,以中国式佛衣为主,有典型地方特色。晚期为北魏末期,出现了较统一的造像样式,为西魏、北周长安造像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景明样式 太昌样式 密集平行线纹 垂帐方形龕楣

北魏佛教空前发展,云冈、龙门石窟均盛于此期。同时,北魏也发生了我国佛教史上的第一次法难——太武帝灭佛。废佛后第六年,文成帝即位,兴安元年(452)下诏复兴佛教。汉长安城和隋唐长安城范围内出土和旧藏北魏佛教造像60余件,绝大部分为石造像,少数为铜造像。见于著录的纪年造像共28件,3件为铜造像,25件为石造像。

以往的研究中,相关的资料性著作较多<sup>1)</sup>。中国学者李淞提出了长安北朝造像“长安模式”的概念<sup>2)</sup>;罗宏才对部分西安北朝造像碑进行了类型学研究和考释,但此书有较多资料不实之误<sup>3)</sup>。宋莉对西安纪年造像碑进行了全面梳理,并对部分无纪年造像碑进行了年代考证<sup>4)</sup>;张燕对耀县碑林藏古代造像和题刻进行著录和考证<sup>5)</sup>。

日本学者松原三郎1954年提出了陕西北魏造像“郿县样式”的概念<sup>6)</sup>。石松日奈子、冈田健等曾对西安附

1)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北朝佛道造像碑精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中国石窟雕塑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石窟雕塑全集5·陕西·宁夏》,重庆出版社,2001年;西安碑林博物馆:《长安佛韵—西安碑林佛教造像艺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编:《西安文物精华·佛教造像》,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孙迪:《中国流失海外佛教造像总合目录》,外文出版社,2008年。本文图片均出自上述著作,以下不再赘述。

2) 李淞:《陕西古代佛教美术》,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

3) 罗宏才:《中国佛道造像碑研究—以关中地区为考察中心》,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年。

4) 宋莉:《北魏至隋代关中地区造像碑的样式与年代考证》,西安美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5) 铜川市药王山管理局编:《陕西药王山碑刻艺术总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

6) [日]松原三郎:《北魏の郿県様式石彫に就いて》,《国華》753号,1954年。

近出土的重要北朝造像进行过介绍<sup>11</sup>。阿部贤次对陕西造像碑铭文的内容进行了分析研究<sup>12</sup>。八木春生较为全面地介绍过西安出土北朝造像，并对其样式进行了初步分析<sup>13</sup>。石松日奈子提出魏文朗造像碑的时代不是“始光元年”，纠正了陕西造像碑的编年顺序<sup>14</sup>。斋藤龙一对陕西北魏密集平行线纹的石造像进行过分析，对所谓“酈县样式”进行了探讨<sup>15</sup>。但目前，尚未有学者对长安北魏佛教造像进行系统性分期研究。笔者在本文中，以纪年造像为中心，对公开发表的汉长安城和隋唐长安城范围内出土或旧藏的北魏佛教造像进行综合性考察，并进行分期研究，拟厘清长安北魏佛教造像发展的脉络。

目前发表的长安北魏铜造像计12件，按形制可分为三类：圆雕造像(1件)、背屏式造像(9件)和板式造像(2件)。背屏式造像占绝大多数，3件有纪年铭文，其中“太平真君二年(441)”铜造像头光为后代伪造，未纳入讨论范围(见附表)。北魏纪年石造像25件，按形制可分为七类：圆雕造像、背屏式造像、造像塔、造像碑、造像龕、三面造像石、单面造像石。本文采纳其中13件，另外11件纪年石造像存在真伪争议，未纳入本文讨论范围(见附表)。通过对上述长安北魏纪年造像形制、样式的梳理比较，结合长安出土无纪年造像，笔者将长安北魏造像分为早、中、晚三期加以讨论。

### (一) 早期造像：5世纪后半叶～太和二十三年(499)

该期造像数量较少，形制以背屏式和造像塔式为主，样式与同时期的云冈造像基本相同，但出现地方特色，又可以分为前、后二段。

#### 1. 前段造像：和平、皇兴年间

此段仅见背屏式造像和造像龕。碑林藏和平二年(461)造像是目前长安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纪年石造像。其主尊双肩浮雕火焰纹炎肩，背光背面浅浮雕佛传故事<sup>16</sup>。铭文仅存“□平二年”四字，被认为是“和平二年”

【图一】和平二年(461)造像  
背屏式,1974年西安西关王家巷出土,砂石质  
高65.5厘米 宽38厘米



11 [日]冈田健：《南北朝後期仏教美術の諸相》，《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3・三国南北朝》，小学館，2000年。  
12 [美]阿部贤次：《陕西省的北魏雕刻：来源、赞助、愿望》，《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  
13 [日]八木春生：《中国仏教美術と漢民族化—北魏時代後期を中心として》，法蔵館，2004年。  
14 [日]石松日奈子：《北魏仏教造像史の研究》，星雲社，2005年。  
15 [日]斋藤龙一：《中国南北朝時代の酈県様式仏教・道教造像に関する再検討》，《中国美術の図像学》，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6年。  
16 西安碑林博物馆：《西安碑林全集105卷》页64，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

〔图二〕皇兴五年(471)石造像  
陕西兴平出土,砂石质



〔图三〕交脚菩萨造像龕  
1983年西安空军通讯学校出土,砂石质



〔图四〕太和七年(483)追远寺造像  
1980年出土于西安市莲湖区,铜板造像  
高11.3厘米 宽10.8厘米



(461)〔图一〕。其主尊头大、身体不太宽壮、衣纹简略,应为地方特色;主尊与胁侍的体量差距很大,主尊占据了整个构图的绝对主要位置,与云冈同时期造像构图特征近似。西安邻近的兴平县出土的皇兴五年(471)造像〔图二〕则忠实地表现出丰壮、立体、衣纹复杂等云冈造像的特点,西安空军通讯学校出土的交脚菩萨造像龕亦同〔图三〕,故其时代亦应在和平年间前后<sup>1)</sup>。

和平二年造像如来衣纹为整齐的平行线<sup>2)</sup>,可能是长安石匠模仿凉州泥塑或云冈石造像的复杂衣纹时进行简化的结果,应是6世纪初期长安造像流行的密集平行线纹的祖型。

## 2. 后段造像:太和年间

纪年造像有太和七年(483)追远寺铜造像〔图四〕,正面造如来跏趺坐像,背面铭文曰:“大代太和七年岁/次癸亥合追远寺/众僧颍川公孙小/劝师道□为皇/帝陛下太皇太后/皇太子敬造佛像/一区供养□□□/□□□普济群生。”另有太和二十年(496)天郁造像石<sup>3)</sup>,三面造像,背面粗糙。正面龕门两侧题记曰“大代太和廿年佛弟子天/郁造释文佛弟扈伯周”、“清信女朝情女/清信士扈迴生”;右侧面题记曰“清信士亡者扈伯□/造像一躯”〔图五〕。

上述二者体量较小,雕刻较粗糙,不能完全代表后段造像全貌。西安近郊蓝田县水陆庵藏有一尊交脚佛坐像〔图六〕,其雕刻立体,头身比例较协调,身体宽壮,袒右大衣,边缘连续Z字形衣褶,风格与云冈太和年间造像接近,其时代应在太和时期。

1) 裴建平:《西安碑林藏北魏佛龕像考释》页114,《碑林集刊》第七辑,2001年。

2) [日]石松日奈子:《北魏佛教造像史研究》页62,文物出版社,2012年。

3) 天郁造像石自1957年以来多次被著录,其出土地有“1955年西安南郊瓦胡同出土”和“碑林旧藏”两种记载。其尺寸亦有“高33、宽32厘米”和“高36、宽34.5厘米”等三种记载。参见李域铮:《陕西古代石刻艺术》页34,三秦出版社,1995年;前揭《长安佛韵——西安碑林藏佛教造像艺术》页2。

造像塔大致有三种形制：

其一，正方体造像塔〔图七〕。四面大龕内主尊如来均体型宽壮，着袒右式大衣，头顶均为素面圆球形肉髻，菩萨戴项圈和V字形短璎珞，较多地保留了5世纪后半以来的风格。

其二，单层亭阁式塔〔图八〕，三面佛坐像均着覆盖右臂式大衣，其中一如来为波状发纹。交脚菩萨体型虽较宽壮，但其他胁侍菩萨的体型变得略纤细，总体来说保持了太和初期的样式特征。

其三，多层楼阁式塔〔图九〕。如礼泉寺出土的5层造像塔，极为精细地仿造了木质楼阁结构，透雕立柱。如来佛衣以偏袒右肩为主，与甘肃省酒泉出土的“北魏曹天护造方石塔”（北魏太和二十年）近似<sup>〔1〕</sup>，时代亦应接近。礼泉寺遗址还出土有2层楼阁式塔，亦应为太和年间遗存。

## （二）中期造像：景明年间—孝昌年间（500—527）

中期的主要造像形制是造像碑，新出现圆雕造像和单面造像石。像体较早期清瘦，佛衣以“褒衣博带”的中国式佛衣为主，出现具典型地方特色的造像样式。中期造像可大致分为前、中、后三段。

### 1. 早段：景明年间（500—503）

继承了早期造像风格，出现“褒衣博带”、“秀骨清像”等中国化的特征，样式有承上启下的过渡性特点。

如景明二年(501)造像塔〔图十〕，四面开龕造像，正面龕下题记曰：“景明二□/岁次辛□/清信士□(姜)/□兴为□/亡父姜□/造石像壹/躯愿忘(亡)父/上生天上/值遇诸佛/逍遥□□/寿缘□祚/下生人间/往生亡者/常遇诸佛。”<sup>〔2〕</sup>该造像塔是继承早期造像风格的代表作。其主尊较

〔图五〕太和二十年（496）天郁造像石  
1965年出土于西安南郊瓦胡同，造像龕，砂石质  
通高36厘米 宽34.5厘米



〔图六〕交脚佛坐像  
陕西蓝田县水陆庵藏，砂石质



〔图七〕正方体造像塔  
西安未央区出土，砂石质



〔1〕 陈炳应：《北魏曹天护造方石塔》，《文物》1988年第3期。

〔2〕 林树中：《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3·魏晋南北朝雕塑》页76，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前揭《长安佛韵——西安碑林藏佛教造像艺术》，页4。

〔图八〕单层亭阁式塔  
西安礼泉寺遗址出土,砂石质



〔图九〕5层楼阁式塔  
西安礼泉寺遗址出土,砂石质



〔图十〕景明二年(501)造像碑  
1949年西安北郊查家寨出土,正方体,砂石质  
通高60厘米 宽56厘米 厚50厘米



宽壮,悬裳较短,体量比例大,延续了太和年间以来的突出主尊的构图方式<sup>41</sup>。

景明四年(503)杜供仁造像碑〔图十一〕,四面造像,碑阳有上下两个大龕,碑阴下部题记曰:“大代景明四年岁次甲申/弟子杜供仁自维先□/少重分乡土运蒙师/恩慈训善路今竭/身木仰为父母见所奉/师敬造释迦文石像一/躯□籍后诚愿三界/合生皆蒙福益所/愿如是必涂果遂/。”该造像碑是目前长安出土的最早的纪年造像碑,保留了较早的云冈传统,如佛衣为内着右衽内衣,左右肩均下垂,佛衣包裹双臂,三角形衣角遮住手部,与云冈石窟第11窟明窗东侧的太和十九年(495)造像相同。

杜供仁造像碑同时亦具中国化特征,其尊像体态略

显纤细,面容清秀俊朗。佛衣衣纹为平行线,用凹凸起伏表现衣纹疏密,悬裳中部呈三角形对称向外翻开,佛衣垂下,衣缘呈小波浪形。这些衣纹特征既不同于太和年间佛衣,也不同于同时期龙门佛造像的连续S纹衣褶,具有较典型的地方特征。

另外,碑林藏景明三年(502)刘保生造像〔图十二〕,正面高浮雕如来跏趺坐像一尊<sup>42</sup>,背面题记曰:“景

〈1〉 胁侍菩萨身形失比例瘦长的例子还有陇东泾川王母宫石窟内藏的圆雕菩萨立像和2012年12月以来泾川大云寺佛像埋藏坑内出土的菩萨立像等。这些失比例瘦长的菩萨立像很可能不是单独供奉,而是做为主尊佛像的胁侍组合供奉的。

〈2〉 前揭《西安碑林全集105卷》,页15。

〔图十一〕景明四年(503)杜供仁造像碑  
1972年西安北郊未央区出土,砂石质  
通高110厘米 宽50厘米 厚14厘米



〔图十二〕景明三年(502)刘保生造像  
碑林博物馆旧藏,背屏式,砂石质  
通高48.5厘米



〔图十三〕景明年间(500-504)刘保生夫妇造像  
背屏式石,碑林藏,砂石质  
通高108厘米



明三年岁次壬辰四月丁丑朔/十一日丁亥弟子刘保生为亡/父母见存眷属敬造无量/寿佛石像一区愿缘此福父  
母/神生天上常卫佛闻法神果妙/唐庆钟七世与十方众生等登□。”碑林藏景明年间(500—504)刘保生夫妇造像  
〔图十三〕,正面高浮雕如来交脚坐像一尊,座基正面题记曰:“清信士刘保生清信女王媚姜为亡女英洛敬造  
石弥勒像一区并有奉□。”<sup>1)</sup>上述两件景明年间刘保生造像,以及西安北郊张家堡尤家庄出土造像碑等,亦具  
有过渡性特点,笔者将其称为长安北魏造像的“景明样式”。

另外,碑林景明二年(501)徐安洛造像石〔图十四〕,三面造像<sup>2)</sup>,背面粗糙。左侧面上龕造菩萨立像,  
左龕门有“观世音”三字。下龕一倚坐佛像,龕下题记曰:“景明二年四月……/徐安洛敬……/弥勒无量……/  
观世音……”<sup>3)</sup>正面大龕主尊的身体修长,对襟式大衣在胸前系带打结,带下垂至腹,基本风格与龙门古阳洞  
北壁上层的释迦多宝并坐像和西起第一龕的主尊佛坐像<sup>4)</sup>等相似,更多体现了“秀骨清像”和“褒衣博带”的中  
国化风格,在长安并不多见。

〈1〉 前揭《西安碑林全集105卷》,页18。

〈2〉 其著录为“徐安洛四面造像碑”,笔者现场观察,背面并无造像,且凹凸不平,出土后经修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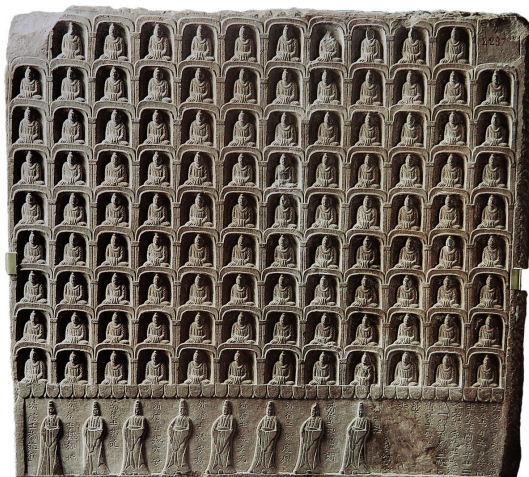
〈3〉 前揭《长安佛韵——西安碑林藏佛教造像艺术》,页2。

〈4〉 前揭《长安佛韵——西安碑林藏佛教造像艺术》,图十四、十六。

〔图十四〕景明二年(501)徐安洛造像  
2004年出土于西安市北郊岗家村,造像龕,砂石质  
高72厘米 宽70厘米 厚20厘米



〔图十五〕延昌元年(512)杨美问造像  
1961年西安市文物处移交到碑林博物馆,  
单面造像石,砂石质,竖长方形  
高89厘米 宽96厘米 厚12厘米



〔图十六〕永平二年(509)道教造像  
日本永青文库藏,砂石质



## 2. 中段: 510年代前后

纪年造像仅延昌元年(512)杨美问单面造像石〔图十五〕,正面造小佛坐像106尊<sup>41</sup>,题记曰:“大代延昌元年岁/壬辰七月五日浮图/主杨美问邑子廿二/人各减家物共造/浮图一级石像三件上/愿帝主群……/愿邑……/未……/……/……法。”千佛如来均着通肩式袈裟,双手合于腹部并掩于衣褶之下。其题记曰“造浮图一级石像三件”,说明造像塔仍然未退出舞台。

本段造像佛衣的平行线装饰出现了密集、细平的趋势。日本永青文库藏永平二年(509)道教造像据说来自西安〔图十六〕<sup>42</sup>,其主尊、胁侍和飞天等均装饰细密平行线。西安南郊沙湾沱村出土背屏式造像,仅存上半截,亦可见密集平行线装饰。有学者认为:这种衣纹样式可能与同时期道教造像有关<sup>43</sup>。

## 3. 晚段: 520年代前后

晚段新出现的圆雕如来立像,造像形制以造像碑和小型造像石为主,尚未发现纪年造像塔、造像龕。无纪年造像中出现横长方体式的小型造像石。样式上流行密集平行线装饰。

孝昌二年(526)如来立像是目前西安最早的纪年圆雕造像,其右侧面阴刻题记,可识“孝昌二年七月三日”<sup>44</sup>〔图十七〕。其雕刻平板,如来头顶有圆柱形高肉髻,身体比例严重失调,腿部极短,双手紧贴身体,极具地方特色。

〈1〉 前掲《长安佛韵——西安碑林藏佛教造像艺术》,页6。

〈2〉 据笔者观察,日本收藏界对藏中国古代有铭文的纪年造像特别有兴趣,因此造成了古玩商在无纪年铭文的造像上伪制纪年铭文的现象。由于笔者尚未对后者进行实地调查,无法判断其纪年的可靠性。

〈3〉 笔者与美国DATMOUTH COLLEGE宗教系副教授GIL RAZ博士交流所得。

〈4〉 前掲《西安文物精华·佛教造像》,页28。

神龟三年(520)造像碑<sup>1</sup>，碑首呈尖顶三角形，碑阳造像<sup>2</sup>，碑阴刻题记“大代神龟三年岁次……清信士”等〔图十八〕。其主尊服饰可见具典型的密集平行线衣纹、倒三角形大衣下摆，与陕西宜君福地水库1号石窟西魏造像(535)、牛家庄摩崖西魏造像(535)较为相似。

此段亦孕育了新的造像元素。碑林博物馆藏有两尊520年前后大型青石造像碑，其一是富平县出土的熙平二年(517)邑子六十人佛道造像碑，其二是正光三年(522)茹氏一百人道教造像碑，二者造像风格基本一致。其石材很可能来自富平县或耀县。这是长安北魏造像的质地从砂石演变为青石的发端，开启了北周隋唐时期长安地区青石造像大流行的序幕。

〔图十七〕孝昌二年(526)立佛像  
1977年长安县王庄曹家村出土，圆雕石造像，大理石质  
通高134厘米



〔图十八〕神龟三年(520)造像碑  
1973年西安北郊的张家堡公社南玉奉村出土，砂石质  
通高78厘米 宽34厘米 厚6厘米



### （三）晚期造像：北魏末期530年前后

此期，造像碑、三面和单面造像石占绝大多数，出现失蜡法铸造铜像——杨伏生造弥勒菩萨像，密集平行线装饰淡出，出现以太昌年间造像为代表的新的较统一的造像样式，具有以下四个个体特征。

#### 1. 如来体态修长，佛衣样式统一

如来佛衣可见3层，通肩大衣可见内衣，衣纹亦较格式化。以太昌元年(532)任长生造像石为例〔图十九〕，其三面造像<sup>3</sup>，正面上部开龕，侧面题记曰：“太昌元年岁次壬子十二月庚申朔十七日讫。”正面大龕下部题记曰：“夫神顾神曜……/以逢其晖至兴……/□以□像……/者□其□见□者□/□以清信士任长生□/宝仰为国主造释迦□/区弥勒一区五三佛十六/佛愿乘此善合门□/安庆难九□□□/延长万庆吉安□/尽生死际见佛闻□/□□□十地同……/等同斯愿/。”主尊修长匀称的体态与龙门石窟药方洞北壁大龕的北魏晚期释迦多宝并坐佛像<sup>4</sup>接近。其主尊大衣下垂衣缘表现为较高的凸起，呈连续S形，以双脚为中心各有两条衣褶带下垂，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北魏普泰二年(532)杨阿真造像碑如来坐像<sup>5</sup>的佛衣几乎完全一致，后者可

〈1〉 前揭《西安文物精华·佛教造像》，页23—24。

〈2〉 该造像虽只有一面开龕造像，但背面经过打磨、平整，且有阴刻题记一铺，故暂将其归类为造像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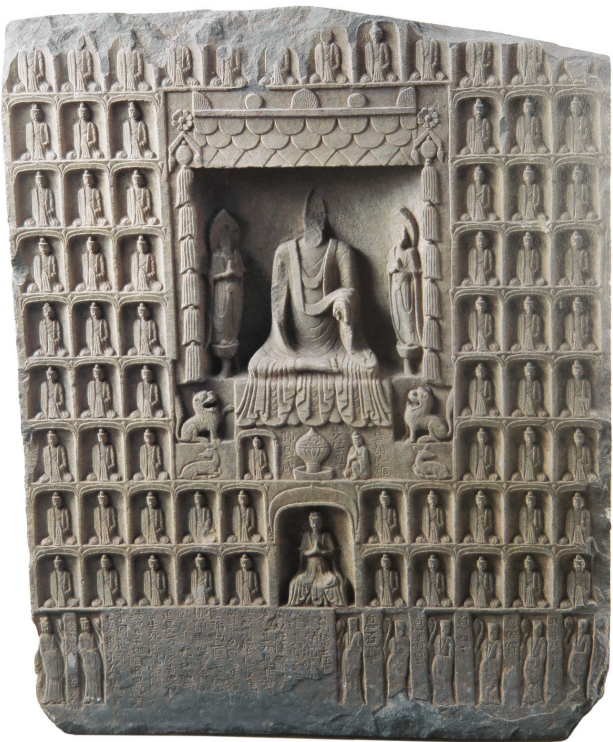
〈3〉 前揭《西安文物精华·佛教造像》，页24。

〈4〉 龙门石窟研究所：《龙门石窟雕刻萃编·佛》页43，文物出版社，1995年。

〈5〉 前揭《中国流失海外佛教造像总合目录》第2卷，页333。

〔图十九〕太昌元年(532)任长生造像

1985年西安北郊未央区十里铺出土,三面造像石,砂石质  
高91厘米 宽72厘米 厚10厘米



〔图二十〕神平三年(530)杨伏生造像

1930年代西安市西关机场工地出土,  
圆雕金铜造像  
高40.8厘米



能出自西安。

可见,此期造像的佛衣,样式统一,形式化的衣纹衣褶替代了中期流行的密集平行线衣纹,表现出较多的龙门造像元素。

## 2. 菩萨身体纤细,天衣样式统一

以神平三年(530)杨伏生造弥勒菩萨像为例〔图二十〕,其方形座基刻题记曰:“神平三年三月八日清信弟子杨伏生敬造弥勒金像一区凭此后福愿四大康宁眷属家润飞妖横祸永相离远一切有生皆蒙此愿。”<sup>〔1〕</sup>“神平”被认为是北魏末年匈奴族万俟丑奴大赵建元年号<sup>〔2〕</sup>。杨伏生造交脚菩萨像,身体修长纤细,

天衣飘逸,头略往下低,与太昌元年(532)任长生造像碑〔图十九〕正面下小龕内的交脚菩萨基本相同。杨伏生造菩萨像头顶的三个花蕾状物装饰品是该期菩萨造像出现的新元素。

## 3. 横长五官和微笑

以太昌元年(532)郭道疆造像石为例〔图二十一〕,造像石正面开上下二大龕,正面两侧边缘刻发愿文,曰:“太昌元年岁次壬子八月十五日佛弟子郭道□为亡父造石像一区□亡者上生天上待遇三□若落三□……/愿生□眷属见世安吉众……保用之……”其下及两侧面另有供养僧、人题名<sup>〔3〕</sup>。其尊神造像面部较宽,五官横长,细长微睁的眼睛和两侧上翘的嘴唇构成了略带微笑的面部。据称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和雅坚斯艺术博物馆藏的两块北魏造像石<sup>〔4〕</sup>亦可见类似的表现,其与郭道疆造像石的菩萨、仙人像有诸多相似之处,估计出自长安的可能性较大。

〔1〕 朱捷元:《“神平三年”杨伏生造鎏金弥勒铜像》,《文物》1979年第7期。

〔2〕 秦明智、任步云:《甘肃张家川发现“大赵神平二年”墓》,《文物》1973年第6期;周伟洲:《甘肃张家川出土北魏王真保墓志试析》,《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3期。

〔3〕 王长启:《西安出土的北魏佛教造像与风格特征》,《碑林集刊·六》页98,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前揭《西安文物精华·佛教造像》,页22。

〔4〕 前揭《中国流失海外佛教造像总目録》第2卷,页308;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页175、477,文物出版社,1995年。

#### 4. 龕楣多样化

太昌元年郭道疆造像的正面大龕，上龕为双交龙龕楣，下龕为盂形龕楣，延续了早中期以来的传统样式。

本期新出现方形垂帐龕楣。以太昌元年(532)任长生造像为例[图十九]，其三面造像，正面上部开龕，侧面题记曰：“太昌元年岁次壬子十二月庚申朔十七日讫。”正面大龕下部题记曰：“夫神顾神曜……/以逢其晖至兴……/□以□像……/者□其□见□者□/□以清信士任长生□/宝仰为国主造释迦□/区弥勒一区五三佛十六/佛愿乘此善合门□/安庆难九□□□/延长万庆吉安□/尽生死际见佛闻□/□□□十地同……/等同斯愿/。”<sup>11</sup>其龕楣为方形，浮雕建筑构件，有U字形和三角形垂帐，龕门两侧垂穗。

这是目前长安发现的纪年最早的方形垂帐龕楣。碑林博物馆藏陕西乾县出土的北魏普泰元年(531)长方体四面造像塔<sup>12</sup>，有两面龕是方形垂帐龕楣[图二十二]。垂帐龕楣是长安北周造像中最为流行的元素，其肇始应在本期。

普泰元年四面造像塔的另外两面龕，透雕植物纹宝珠龕楣，前文述美藏普泰二年(532)杨阿真造像碑正面大龕亦同。西安西关出土单面造像石，其正面上龕为盂形龕楣，下龕为透雕植物纹宝珠形龕楣。未央区六村铺东席村出土的单面造像石、碑林旧藏田僧敬造像龕等造像龕楣均同，三者时代也应在530年前后。

另外，碑林藏永熙三年(534)比丘尼道成造像<sup>13</sup>[图二十三]，浮雕如来跏趺坐像，方形基座阴刻题记曰“大魏永熙三年/五月十/日比丘尼道/成为父母敬/造释像一/区愿使/亡父母上进/天宫值遇诸/佛若□□□/□解脱□为/□界众生一时成佛/……/……/”。其主尊衣纹出现简化趋势，可能是北周如来像佛衣简略衣纹的祖形。

北魏晚期的太昌年造像样式表现出了统一的面貌，为西魏、北周时期长安造像面貌奠定了基础，笔者称之为长安北魏造像的“太昌样式”。

〔图二十一〕太昌元年(532)郭道疆造像

1940年代西安市西郊潘家村出土，三面造像石，砂石质  
高94厘米 宽45厘米 厚10.5厘米



〔图二十二〕普泰元年(531)造像塔

陕西乾县出土，四面造像，砂石质，长方体



〈1〉 前揭《西安文物精华·佛教造像》，页24。

〈2〉 前揭《长安佛韵——西安碑林佛教造像艺术》，页17。

〈3〉 前揭《西安碑林全集105卷》，页60—63。

【图二十三】永熙三年（534）比丘尼道成造像  
碑林博物馆旧藏，背屏式，砂石质，上部残缺高26厘米



#### （四） 结语

从目前出土的材料来看，长安北魏造像与平城、洛阳的差距较大。美国学者阿部贤次认为：“陕西长安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与外围的地方性遗址相对独立的都会中心，陕西的北魏雕刻并不是都会风格影响下的地方表现形式。”<sup>①</sup>其意是指陕西长安的北魏造像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脉络，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值得商榷。从上文分析可知，北魏长安造像风格从早到晚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来自都城的影响，特别是本文分期中的早期和晚期造像，基本忠实反映了云冈、洛阳流行的造像风格，长安并不是所谓的“独立的都会中心”。

自5世纪中叶始，长安造像在不断接受来自云冈、龙门或其他地区造像样式影响的同时，间或短暂地出现了一些地方样式，呈现出一种纷繁复杂的面貌。这种状况与长安在北魏王朝中的边缘地位是相互对应的。北魏早期长安与云冈造像的相似处暗示着长安与云冈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交往；北魏中期长安造像与洛阳造像的巨大差异，可能反映出二地治统集团之间存在重重矛盾；北魏晚期太昌年间长安佛教造像样式的统一和

洛阳风格，应该与关陇贵族集团对长安的经营及即将来临的东西魏分裂密切相关。这将是笔者以后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附表】本文未采纳的北魏纪年造像一览表

序	年号/纪年	名称/形制	质地	藏地
1	永兴三年(411)	背屏式造像	砂岩	西安博物院
2	永兴三年(411)	造像碑	砂岩	西安博物院
3	始光甲子元年(424)	始光甲子元年造像碑	砂岩	西安博物院
4	始光三年(426)	背屏式造像	砂岩	西安博物院
5	太平真君二年(441)	圆雕铜造像头光	青铜	西安博物院
6	太平六年(?)	背屏式铜造像	青铜	西安博物院
7	太和四年(480)	背屏式石造像	石灰岩	西安博物院
8	景明二年(501)	赫连歧背屏式造像	砂岩	碑林博物馆
9	正始元年(504)	薛鸞花背屏式造像	砂岩	西安博物院
10	神龟三年(520)	造像龕	砂岩	西安博物院
11	正光元年(520)	白石覆莲座	白石	西安博物院
12	孝昌元年(525)	背屏式造像	砂岩	碑林博物馆
13	永兴元年(532)	造像龕	砂岩	西安博物院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责任编辑：何 芳)

① [美]阿部贤次：《陕西省的北魏雕刻：来源、赞助、愿望》，《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与考古》页461，文物出版社，2000年。